

1867年，曾国藩在李鸿章的帮助下，初步平定了捻军起义。“居功至伟”的曾国藩很快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。刚刚上任的曾国藩没有忘记向西方学习的初步成果——江南制造局。在观看机器操作的过程中，曾国藩心花怒放。这一切容闳都看在眼里，他认为机会就在眼前，要不顾一切地抓住它。于是，容闳鼓起勇气向曾国藩提出了建议，他认为大清引进这些外国的机械容易，但是在大清还没有人懂这些机器运作的原理。因此，当务之急是应该在机器制造局旁边开设一个学校，让更多大清的优秀学子学习这些工程上的理论与实验，这样大清就能自己制造机器而不用依赖外国。

曾国藩停下脚步，认真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身后这个年轻人。在他看来，如此年纪就有这种眼光，实属不易。于是曾国藩对容闳这个建议很是赞赏，决定尽快实施。

容闳的教育计划

就在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之后，很快就得到批准，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了兵工学校。也许在现在看来，新设个学校并不算什么。然而在当时以孔孟传道的中国，学习西方这些“奇技淫巧”就是不入流，就是不务正业。不仅是容闳，甚至曾国藩和丁日昌这些支持他的朝廷大员也都顶着巨大的压力，而且朝廷里的顽固派对这种做法更是嗤之以鼻。这让

容闳深深地感受到曾国藩和丁日昌这两位地方洋务官僚的不易，更是引他们作为自己的知己。在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后，容闳到苏州的公署内去找丁日昌，他向丁日昌详细地述说了自己“教育救国”的计划。让容闳没想到的是，丁日昌拍手叫好，而且向容闳说自己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，苦于没有人支持。容闳大喜过望，当即表示会尽快将自己的意见缮写成书面报告，提交给丁日昌，这样丁日昌就可以向朝廷汇报。在回上海的路上，容闳信心满满，他没有想到朝廷里竟也有如此深明大义、眼光长远的官员，这让他对这个国家、这个朝廷又有了信心。

回到上海的容闳，没有休息，他把自己关起来，脑子里思考的就是一件事——如何把这个计划写好。几天之后，容闳的意见书出现在了北京各部衙门的案头。

“一，中国应该组织一个合资汽船公司；二，政府应该选派一些优秀青年出洋留学；三，政府应该设法开矿，以尽地利；四，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。”容闳的四条建议中，派学生出洋留学位列第二条。其实这并不是容闳改主意了，而是这样不至于让这一建议突兀显眼，引起顽固派官员的强烈反对。奏疏送到北京总理衙门文祥那里，容闳信心满满地等着朝廷的答复，然而上天偏偏就在此时跟容闳开了一个大玩笑，在成功之前，又一次考验了他。

两个月后，丁日昌给容闳去信，说总理衙门的文祥在

“丁忧”，没有办法处理政事。按照中国传统儒家的标准，官员“丁忧”期间，不处理政事，不对朝廷上的公文发表意见。容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顿足叹息不已，要知道当时官员居丧三年，三年时间沧海桑田，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。一想到这么一个好机会被浪费掉，天不遂人愿，容闳就快快不乐。为了不让这一计划退出人们的视野，从1868年到1870年这三年间，容闳时不时就向丁日昌提及此事，而且还叮嘱丁日昌也要经常向曾国藩多提一提。

三年后，去苏州公署向丁日昌巡抚提此事也成了一件例行的惯例。当1870年春天，容闳又像往常一样，与丁日昌探讨问题，顺便提及自己的计划，但是出现在丁日昌脸上的，不再是以往的神情，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脸凝重。在容闳的细问之下，才知道北方天津发生了教案。直隶总督崇厚因为办案不利，外国人和中国人两方均不满意，因而被朝廷革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朝廷委派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、江苏巡抚丁日昌和毛昶熙等协同办理此案。不日丁日昌就要北上天津去和洋人交涉了，这吸引了中外各界的眼球，容闳的计划又遥遥无期了。这一次，容闳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知道自己再争辩也无能为力。眼看着丁日昌这几天忙里忙外，容闳心情非常没落。然而就在丁日昌走后没多久，容闳就收到了他从天津发来的电报，希望他能来天津当中外之间交涉的翻译人员。接到这一任命，容闳背起行囊，北上天津，让他没有想

到的是，这一去竟又迎来了希望之光。

去到天津的容闳不失时机地向曾国藩提及派幼童出洋留学事宜，并且向丁日昌寻求帮助。一日，在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，容闳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住所准备休息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，容闳起身开门之后，发现是丁日昌来找他。深夜造访，必是非同一般之事。丁日昌坐定之后，嘴角扬起一丝微笑，他得意地告诉容闳，派员出洋留学的事情，曾国藩大人已经同意了，由朝廷的四位大员联衔入奏，请求朝廷挑选你写的条陈逐步实行。

容闳一听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这件事情终于有眉目了！多年后他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写道：“予闻此消息，乃喜而不寐，竟夜开眼如夜鹰，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，忘其为僵卧床第间。”

两天之后，由曾国藩、李鸿章联衔上奏的奏章出现在了皇帝的案头。这一次，容闳的建议再也没有石沉大海。1870年，就在曾国藩因为天津教案处理不利，返回两江之后，在南京总督府，曾国藩收到了朝廷的上谕，皇帝的批复很简单，“依议，钦此”。很快，曾国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容闳，得知消息的容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上谕虽说只有短短的四个字，他却等了十多年。这一刻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，这让他内心无比高兴，从此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开了一个新纪元。

大清要派出第一批留学生了，派到哪个国家当然也是朝廷考虑的重要因素。在思索再三之后，朝廷决定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。之所以选择美国，并不是因为容闳在美国留过学，而是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。早在1868年，清政府就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。使团由三位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组成，他们是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，总理各国事务章京志刚和孙家谷。美国是该使团到访的第一个国家，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欢迎宴会上表示：中美两国择其善者而为之，岂不日见其盛哉。中方代表蒲安臣也表示：中国准备将你们的（西方）文化嫁接在它古老的文明上，只要你们对中国公平合理，将来的希望是无穷的。正是在这种氛围中，1868年7月28日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在华盛顿正式签字，其中规定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，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；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，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；美国总统和蒲安臣的演说，以及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的签订，让大清的留学生去美国，有条约保障，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。朝廷选择了美国，让容闳更加欣喜，毕竟他在美国呆过几年时间，更加熟悉美国的环境，可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去美国的孩子完成学业。在随后的几天，他顾不上再发自己内心的感慨就投入了更加忙碌的前期工作之中。

在派员留学之前，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。第一，

派送出国学生的数额；第二，设立预备学校；第三，商量出洋的年限。为了解决种种问题，清政府特设了一个留学事务所，由陈兰彬和容闳来管理其中的事务。由于陈兰彬是翰林学士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子，因此他主管留美学生的汉文功课，而容闳则监督留美学生的其他各项功课。在事务所成立之后，他们开始商议招考章程，经过他们的反复磋商，决定按照容闳以前的建议，暂定留洋学生人数为120人，分四批出国。学生们的年龄定在12岁以上，15岁以下。不仅如此，出国学生还需要父母亲人无犯罪记录，家庭条件较好，身体健康没有疾病，才能被入选为留洋学生。

入选之后，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，汉文的读写功底必须过关，优异者进而在中国入预备学校，学习一年的英文和中文。在出洋之前要和他们的家人签订合同，出国的钱由政府来出，但是在这十五年内由于疾病或意外而身亡的，政府概不负责。就这样，容闳和曾国藩初步定下了招考章程。

随后，容闳携招考章程去上海，先行设立一所预备学校，准备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的入学预习。此时的容闳满心欢喜地等着上门报名的家长，在他的预期中，送孩子出洋留学而且还是政府公费，肯定很多人挤破头来报名。然而，等了几天的之后，除了少数几个孩子之外，并没有出现容闳所想象的那个场景。他可能忘了此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，并且西方资本主义的空气逐渐吹进这个古老的帝国，

然而，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开放，尤其是在广阔的内陆地区，大清的子民们依然过着传统的生活，读书—科举—做官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。无奈，容闳只好去香港的英国政府开设的学校招生。于是在120个留美学童中就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场面，北方的儿童极少，来报考的几乎都是广东人，而且他们多半都来自香山县。这样，南方人有八九，江浙人又有一二，北方人几乎没有。

就在留学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，容闳从南京得到曾国藩去世的噩耗。对于曾国藩的死，容闳感到非常伤心。一方面，曾国藩作为容闳的“伯乐”，对其有提携之恩；另一方面，在当时的大清曾国藩是数一数二的能臣干将，国家中心赖其为栋梁。更何况，由曾国藩支持的幼童留学方兴未艾，他都没有看到自己手植的桃李就撒手人寰，容闳在伤心之余不免替曾国藩感到惋惜。然而，当他想到创业之人，播种于世，中国教育的前途已经蒙其嘉惠，想到此，容闳又为曾国藩感到骄傲。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也为了尽故人未竟的事业，容闳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帮助这些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。

1872年夏，天气依然闷热。容闳的内心却是激情飞扬。因为就是这一天，大清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将从中国出发，渡太平洋而赴美国。这时的容闳已经在去往美国的路上，他准备在美国迎接这批来自古老帝国的幼童们。

护送第三批去美国的幼童的是一个名叫祁兆熙的官员。他是上海人，早年在法国兵驻扎上海时，他初步接触到洋务并且学习法语。1865年，他到江海北关办公，再学英文，三年之后，他就已经能自己翻译洋文，不再需要翻译人员。多年在商埠的经验，让祁兆熙比帝国其他官员更知道洋务的重要性和以后世界的趋势。因此，就在大多数官员看不起出洋留学这一途，唯恐避之不及之时，祁兆熙却将自己年仅12岁的儿子送往美国。

也许当时人都不看好这 120 个孩子，认为他们走上了“邪门歪道”。然而，正是这些身影活跃在晚清和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，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眼的风景线。